

# 族群認同

## ——「台獨」的主要動力

• 薛 力

台獨的主要動力是台灣人的族群認同。現在流行的基於自由主義、現實主義和意識形態的解釋都只說出了台灣問題的次要原因。在一定條件下，文化上的族群認同會導致對主權的追求。從這一視野，我們將很容易理解近二十年來兩岸關係的互動與台灣政局的演化，並有助預測台灣未來的政治走向。

隨着台灣執政當局由國民黨變為民進黨，台灣問題的內涵也經歷了一些變化。在兩蔣時期，爭論的是兩岸哪一方主導統一；而在李—陳時期，則是台灣鬧獨立且愈演愈烈。這時台灣獨立訴諸所謂國家認同（或曰政治認同），其基礎是台灣人的族群認同（或曰文化認同）。台灣人形成新的國家認同的標誌有二：1999年，李登輝的「兩國論」和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sup>①</sup>。

台灣人族群認同形成的過程源遠流長、原因複雜。80年代之後這一問題顯性化，在多種因素的作用下日益發展，在80、90年代演化為新的國家認同。換言之，台獨的主要動力是台灣人<sup>②</sup>的族群認同。筆者認為，現在流行的基於自由主義、現實主義和意識形態的解釋，都只說出了台灣問題的次要原因。文化上的族群認同會表

現為政治上的訴求，在一定條件下，會導致對主權的追求。從這一視野，我們將很容易理解近二十年來兩岸關係的互動與台灣政局的演化，並有助預測台灣未來的政治走向。

日本人從1895年起統治台灣五十一年。日治時期，佔領者為了獲取長遠利益，對台灣的統治手法不同於在朝鮮等其他殖民地，而是有套經營、開發台灣的計劃。1898年兒玉源太郎任台灣總督、後藤新平任民政長官後，即改變此前對台灣人的反抗一味強力鎮壓的做法。「政治上，採取懷柔政策，召開鄉典會、揚文會，頒發紳章以籠絡地方士紳；社會政策上，『尊重舊俗』，對台灣社會固有的風俗習慣予以保留和一定的尊重，恢復保甲制度；對軍事反抗力量以『招撫』為主」<sup>③</sup>。他們在台灣提倡日台同化、推行民選議員運動；利用當地

\* 感謝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邢悅博士在此文寫作過程中的指點，文中不當之處由筆者負責。此文是壓縮稿，全文將在《二十一世紀》網絡版刊出。需要說明的是，運用國關理論分析台灣問題，絲毫不意味着筆者認為台灣問題是國際問題，而是希望用一種新的理論視野，加深對相關問題的認識與把握。



的士紳人物，允許台灣人創辦自己的報紙《台灣民報》。給地方士紳以尊重和禮遇，容忍部分人保留漢名、著漢裝。推廣教育，鼓勵青年學生到日本深造，致使「1942年台灣成年男女分別有54%和43%可用日語應付日常事務」<sup>④</sup>。除了大力鼓勵日資產業到台灣發展外，「1930年起積極推進台灣的工業化進程，特別發展與軍需相關的產業(如有色金屬產業)和基礎設施(道路、橋樑、港口、機場等)」<sup>⑤</sup>。

凡此種種，客觀上弱化、瓦解了台灣人的抵抗意識。到日本統治後期，相當部分知識份子自覺不自覺的形成了「皇民意識」，甚至出現了一批認同日本的「皇民文學」作品。陳映真對此有精妙的述評<sup>⑥</sup>：

否定、鄙視、憎恨被殖民台灣人(中國人)的主體性，把自己改造成日本人，使自己像一個日本人那樣地生活、思考、並且像一個日本人那樣地效忠和崇敬日本天皇，終於做為日本人而效死——這就是40年代台灣皇民文學主題的真髓。

有相當多受日化教育者到政府機關工作。這一部分知識份子已經疏離中國認同，他們或傾向於認同大和民族，或像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所宣示的：自己是被中日兩個亞洲大國拋棄的孤兒。這就為以後建構台灣的族群認同埋下了伏筆，或者說，台灣人的族群認同萌芽於日本殖民統治後期。

二戰結束，日本投降後撤離台灣，本來是強化台灣人認同中國的好時機，遺憾的是，在大陸一敗塗地的國民黨沒能利用這一時機，反而因國民黨「劫收」大員的表現激發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國民黨血腥鎮壓給台灣人造成強烈的印象：外來人都不可信，蔣介石比日本人還殘酷。這是台灣人構建自己的族群認同的一大轉折點<sup>⑦</sup>。在國民黨接手台灣的最初幾年，台灣民眾總體生活水平也有所下降。國民黨帶去的百多萬人只佔人口少數(1946年台灣總人口為624萬，1949年增至753.8萬)，卻佔據了黨、政、軍、法各部門的絕大部分職務，尤其是中高級職務，台灣本省人極少獲得進入政府機構工作的機

日本殖民統治後期，相當部分的台灣知識份子形成了「皇民意識」。二戰結束後日本撤離台灣，可惜國民黨沒能利用這一時機強化台灣人認同中國，反而激發了「二二八」事件，國民黨鎮壓給台灣人的印象是：蔣介石比日本人還殘酷。這是台灣人構建自己的族群認同的一大轉折點。圖為「二二八」事件當天台北火車站前的騷亂情況。

1986年民進黨成立，台獨的重心轉入台灣島內，「洋獨」、「土獨」匯流。蔣經國晚年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大量提拔本省人，推行省級以下立法司法行政三部門的選舉，這些措施既促進了台灣政治的民主化，也使得長期壓抑着的省籍矛盾表面化，因為台灣的民主化過程，相當程度上是建構在族群間的意識衝突上。

會<sup>⑩</sup>。這無疑強化了台灣人對「外省人」的不滿。他們把1945年後到台灣去的大陸人稱為「外省豬」，即強烈彰顯了對外省人的不滿。

雖然台獨勢力在台灣島內遭到國民黨壓制，但那些在日本、美國的台灣知識份子則組織起來，通過建構族群認同來推動台獨。他們多是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培育出來、具有「皇民意識」知識份子。由於日台經濟文化交流密切、人員大量往來，40年代台灣人旅居海外的人數以日本最多，達兩萬多人。所以早期海外台獨活動的中心在日本，其中以廖文毅、廖文奎、吳振南、史明等最為活躍。

60年代後海外台獨的重心轉到美國，其基礎是台灣留美學生、學者與移居美國的台灣中產階級。與日本的皇民化台獨不同，他們反思台獨活動的基本思想和做法，不以向美國請願的方式活動為主，而是提出建立自己的實力及獨立運動是群眾運動，甚至必須不惜流血，醞釀成立全球性「台灣獨立聯盟」。不過，他們因執行「暴力革命」路線而被美國視作暴力恐怖組織，於是調整策略，而彭明敏等人主張的「以務實、民主、合法的途徑追求台獨」路線為大多數海外台獨份子接受。他們通過遊說美國國會、動員教會力量等，在美國形成了一股相當強大的台獨支持勢力。他們針對蔣家父子的專制統治，根據美國的情況，將台獨目標包裝成追求人權、民主和自由。在台灣前途問題上採取「創造性曖昧」的策略，提出「住民自決」的主張。陳少廷等人搞的「住民自決論」挑動省籍矛盾，強化本省人的族群認同，排斥外省人。由於有不少法學家參與創建這

一理論，使它成了台獨的主要理論依據之一。

宗教力量的作用也值得一提，尤其是有二十萬會員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會(URM)，訓練出不少「台獨頂尖人物」。他們先是成為民進黨內急獨勢力「基本教義派」主力，後又成為「台聯黨」的骨幹。台獨份子的這些活動，大大促進了本省人的集體身份認同，有助於實現他們的目標——台灣獨立。

在台灣島內，台灣本省人在族群認同上的訴求，因國民黨高壓政策而表現為零星或間接的台獨活動形式。如《自由中國》雜誌與雷震案等，從表面上看不過是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追求民主與自由，但我的分析是：

(1) 反對國民黨這一專制的「外來政權」，很容易與建構台灣族群認同的訴求互相激盪，如沒有反抗外在壓力，族群認同的形成將是非常長期的過程。

(2) 這些事件的參與者中，許多人後來成了台獨的中堅人物，他們在族群認同上的訴求有個由暗到明的過程。

(3) 在國民黨以戒嚴法統治台灣期間，尤其是60年代的「政治冰封期」，島內台獨訴求不可能像海外那樣直接表達出來，而追求公民的言論自由、為民眾爭取權利則是現實的選擇，有助於爭取民心。這些活動也可以為台獨勢力積累社會資本。

以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為標誌，台獨的重心轉入台灣島內，「洋獨」、「土獨」匯流。蔣經國晚年力排眾議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大量提拔本省人，推行省級以下立法司法行政三部門的選舉，這些措施既促進

了台灣政治的民主化，也使得長期壓抑着的省籍矛盾表面化。因為「台灣的民主化過程，相當程度上是建構在族群間的意識衝突上」<sup>⑨</sup>，外省人、本省人各自的族群認同，在選舉過程中得以強化<sup>⑩</sup>。

李登輝上台後，台獨勢力更加有系統、有步驟地排斥「統派」力量，統派的言行被歸結為「不愛台灣」，並推進「去中國化」。民進黨在1986年9月28日成立時就將「台獨」列入黨章。2000年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上台，在2001年的「立委」選舉中，泛綠陣營贏得立法院225席中的104席<sup>⑪</sup>。按省籍劃分，本省籍190名，佔84.44%；外省籍35名（其中1名來自金門，8名是「海外立委」）<sup>⑫</sup>，與台灣本外省人口比例相當吻合（2,300萬台灣人口的組成為：福佬人加客家人佔86%，原住民佔2%，外省人佔12%）。這昭示着台灣人已經成了島內政治生活的主流，由外省人擔任「總統」、「立法院長」已難以被接受。

我們應當注意到：在台灣的政治術語中，「民主化」與「本土化」常常十分相關。在民進黨基層支持者的觀念中，是將台獨與出頭天、民主等同起來<sup>⑬</sup>。外省人很少支持民進黨。省籍矛盾在選舉時更為突出，這一點在1989年的選舉中表現得特別典型。應該指出的是：國民黨的支持者中包括了相當多的本省人，牽制着國民黨，只能選擇「穩健」的政策——維持現狀、緩獨。因此不能簡單認為支持國民黨的人的族群認同是傾向於外省人。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隨着老一代陸續淡出政治，新增加的年輕選民有80%認同台灣。新黨現已泡沫化，以推進「一國兩制」為競選口號的李敖得

票率不到1%。這些事實都顯示：主張統一特別是盡早統一的意識已趨於邊緣化，主流群體的爭論演化為維持現狀、緩獨、急獨三派之間的較量。

綜上所述，可以認為：本省人已經成為台灣政治生活的主體，文化意義上的族群認同已經轉化為政治意義上的國家認同，即，新的「國家認同」已經初步確立。其表現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從1989年的16%上升到62%，認為是「中國人」的從1989年的52%降到19%<sup>⑭</sup>。所謂新台灣人不是一個新民族，而是由來源不同的幾個「次族群」融合的新族群。經濟發展、自我意識的增強、對自由民主的信仰等等合力作用，致使台灣人要求建立具有「維斯特伐利亞合法性」的國家。

筆者的觀點是：台獨的原因是複合的，但族群認同是主要原因。換句話說，構成台獨的充分必要條件是複合的，其中族群認同是首要條件。即使美國軍事支持這一台獨的重要動力，也已變得與台灣人的族群認同密切相關。90年代以來，美國支持台灣的原因中，民主價值認同的成分在逐步上升<sup>⑮</sup>。「三二〇公投」就是台灣打的「民主牌」。在台灣人族群認同中，尤其在年輕人中，對「民主自由」的價值認同是重要的一個方面。

必須說明的是：學術分析與政治觀點是兩回事。上述分析絲毫不意味着筆者認為台獨具有正當性或認為台獨是無可逆轉。我們知道，在聯合國的193個會員國中，只有大約10%是由單一族群組成的，其餘90%國家由多個族群構成。這說明多族群國家在當今的民族國家體系內具有完全的合法性。沒有任何國家的中央（聯邦）政府會坐視國家分裂，維護國家統一、促進國家繁榮是各國政府的首要職

老一代陸續淡出政治，新增加的年輕選民有80%認同台灣，新黨現已泡沫化，以推進「一國兩制」為競選口號的李敖得票率不到1%。這些事實都顯示：主張統一的意識已趨於邊緣化，主流群體的爭論演化為維持現狀、緩獨、急獨三派之間的較量。

責。筆者認為，大陸近二十年來在處理台灣問題上的政策效果欠佳，不能不說與大陸在台灣問題分析、判斷上的失誤有關。因為只有在準確地認識台獨的來由和機制，我們才有可能形成富有成效的打擊、削弱台獨的戰略，才有可能實現祖國統一。

### 註釋

① 以1999年5月陳水扁主導民進黨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7月李登輝提出「兩國論」為標誌，台灣「朝野」兩黨政治勢力在台灣新國家認同上達成「共識」，以後不過是具體實施的問題。他們在2000年台灣「大選」前夕作出這樣重大的宣示，當然是事前權衡了其民意基礎和對選舉的影響，認為這樣做符合主流民意，有助於獲取更多選票。當然，對李登輝來說還有另外一層考慮：為下一步分裂國民黨埋下伏筆。

② 本文的台灣人指台灣本省人。一般而言，1945年之前在台灣的居民及其後代為本省人，1945年之後去的居民及其後代為外省人。本外省人通婚所生後代身份劃分從父親。台灣本省人包括三部分：福佬人（福建各地去的移民後代）、客家人、原住民。

③ 陳小沖：〈日據初期台灣人民抗日武裝鬥爭中「歸順」問題初探〉，《台灣研究集刊》，2002年第4期，頁66。

④ 王曉波：《台灣的殖民地傷痕》（台北：帕米爾書店，1985），頁107。轉引自陳奉林：〈關於日本與台灣關係的一些思考〉，《台灣研究》季刊，2002年第3期，頁71。

⑤ 陳奉林：〈關於日本與台灣關係的一些思考〉，頁71。

⑥ 方孝謙：〈日據後期本島人的兩極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01年6月號，頁185-223。

⑦ 比較公認的看法是：「二二八」事件是個轉折點，台灣人族群認同

由此初步確立。國民黨後來為此事平反道歉，也印證了這一事件的特別意義。參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876-77。關於「二二八」事件後四十年，國民黨對此初步予以平反道歉，見2002年5月13日搜狐網消息，<http://zhengzhou.news.sohu.com/news/67/33/news200833367.shtml>。

⑧ 王藝生：《台灣史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頁95-105，及倪健中主編：《台灣禍福：梳理大陸與大洋之間的歷史流變》，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525-28。

⑨ 《中國時報》（台灣），1998年6月5日。轉引自陳孔立：〈台灣政治的「省籍—族群—本土化」研究模式〉，《台灣研究集刊》，2002年第2期，頁3。

⑩ 胡克威：〈台灣民主化階段中階級背景與投票行為關係的探討〉，載劉兆佳等編：《市場、階級與政治：變遷中的華人社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00），頁413-27。

⑪⑫ 陳孔立：〈台灣政治的「省籍—族群—本土化」研究模式〉，頁5：5。

⑬ 范希周：〈現階段民進黨大陸政策分析〉，《台灣研究集刊》，2002年第4期，頁20。

⑭ Philip P. Pan, "New National Identity Emerges in Taiwan: Culture Shifting away from Mainland", *Washington Post*, 2 January 2004.

⑮ 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全球衝突與合作研究所主任、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謝淑麗（Susan L. Shirk）即表示，普通美國人現在對台灣的想法是：那兒跟我們一樣，實行民主制度。

薛力 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生，曾在《戰略與管理》、《世界經濟與政治》等刊物發表文章。